



# 陕南地方剧种的奇葩

## ——紫阳民歌剧六十年巡礼

叶松成

紫阳民歌剧诞生于1959年,如果以这个时间为基点,从那时到现在,民歌剧风雨兼程,已经拥有了六十年的履历。六十年是人生的一个甲子,而在漫长的时光中,一个甲子的长度,实在是短暂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它的价值却已完全突破了物质所呈现的具象,它的精神高度让距离无法丈量。

紫阳民歌剧的萌芽,其实早在建国前期和建国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端倪。1959年,是民歌剧诞生成熟的标志,但这个时限的界定,只是相对的,或者说从这个时段以后,民歌剧作为一个新型剧种才真正被确立下来。但民歌剧的衍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的过程我们不能抹去。据史料记载:1941年紫阳芭蕉口中学,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曾自编、自导、自演民歌短剧《刮地皮》,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对人民的盘剥,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与之斗争。1950年至1958年,紫阳县文化馆宣传队、学校及各地的业余剧团,先后用民歌小调排演《抓壮丁》《斗地主》《抗美援朝》《送公粮》《捉菩萨》等短剧,这些短剧皆简单、粗朴,情节自由、随意,属于早期民歌剧的胚胎。嗣后,县剧团在乡镇巡演中,积极搜集整理民歌小调,并填上新词,多次登台演唱,这种清新活泼的艺术形式,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民歌对党和民歌连曲、民歌小调,总体上看,形式构成还是单一的,基本上没有情节的勾连和铺垫,更谈不上完整的叙事,但它为民歌剧这种新型剧种的诞生,做了可贵的探索和艺术铺垫。

民歌剧的发轫之作,产生于五十年代末,即1959年3月,当时为了给庆祝建国十周年和安康地区首届专业剧团汇演活动准备一份厚礼,紫阳县剧团在团长陈定余的带领下,由黄群众执笔编剧、导演兼音乐设计,组织艺人李玉成、钟玉凤、舒群儒、王大佩及音乐工作者项楚乔等,开始紫阳民歌剧的试创工作。“对于紫阳来说,这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前人没有做过。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带有小情调节目的民歌小演唱,或是一种启示。作者首先面临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黄群众想到了当地民间传说故事,其中一个关于赌博的故事让他产生兴趣,但写来写去,总觉得戏剧性不够,后在《今古奇观》中读到一篇《吕大夫还金骨肉》,给了他灵感上的触动,于是便借鉴其情节节笔编写……剧情写赌博成性又吸毒成瘾好吃懒做的王二、刁氏夫妇,在兄长王大多年离家经商之时,欲将亲嫂梁氏出赁转嫁,以获取财物,满足其赌、毒之需。其嫂梁氏窥破二人歹毒算计,于歹徒抢夺人当夜,将刁氏灌醉,以刁氏作为替身,让王二落了个自作自受、自食苦果的下场,而梁氏终于夫妻团圆。”(张宣强:《〈嫁嫂〉漫谈》,《安康文学》(戏曲专号),2013/夏,第18—19页。)

《嫁嫂》试创成功,1959年5月,参加安康地区首届专业剧团汇演,一时震惊地方戏剧舞台。1960年3月,《嫁嫂》代表地区参加全省汇演,受到观众广泛好评,省广播电台还播放了录音。此后,省人民政府正式将紫阳民歌列入陕西地方剧种之一,并载入《中国戏曲曲艺大词典》。民歌剧《嫁嫂》创作、演出的成功,轰动十里八乡。一年内,剧团在

紫阳巡回演出200余场,受到山区群众的青睐和喜爱。不少区、乡业余剧团争相排演,当时全县流传“剧团创新戏,紫阳民歌剧”、“听说演《嫁嫂》,放下碗就跑”的赞颂俗语。此剧后来又流传到邻省、邻县,影响依然很大。

1983年,紫阳民歌列入《中国戏曲剧种表》,至此,紫阳民歌剧以剧种的形式被确定下来,而作为民歌剧发轫之作的《嫁嫂》,其经典性,在洋洋大观的紫阳民歌剧中,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嫁嫂》之后,紫阳民歌剧的创作、演出蔚然成风。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全县产生的剧目约82个,真正搬上舞台的就有24个。当然《嫁嫂》之后产生的一部分民歌剧(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如《绿海红心》《芭蕉夜雨》《春到茶山》《木匠迎宾》《红松林》等,这些民歌剧,除形式上效仿《嫁嫂》外,其内容相对单一,尤其是人物脸谱化严重,民歌与剧情的结合显得生硬,作品多是应时应急之作。而“文革”十年,紫阳的民歌剧创作虽然没有完全停滞,但受政治高压和政治环境的威慑和影响,民歌剧创作基本上服务于政治、服从于权力、剧情的模式化、矛盾冲突的虚假性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桎梏。

1979年7月,诗人兼剧作家张宣强创作出民歌剧《牧羊恋歌》,这应该是紫阳民歌剧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作者后来回顾说:“1979年初,为迎接安康地区及陕西省群众文艺汇演,领导布置给我任务:创作一出紫阳民歌剧。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艺工作者都有一种‘松绑’的轻松感,我亦有心‘表现’一下,虽然对戏剧不在行,却也欣然接受了任务。构思时意欲在题材方面有所突破,写爱情。当时,文坛被‘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禁锢十年,爱情题材仍然是一个相对敏感的禁区。怎样写?我想到了童年时看过的《小放牛》《打猎草》等一些传统小戏,皆为男女青年载歌载舞说唱唱于劳作中表现生活情趣和懵懂的爱情,朴素、单纯,没有复杂的情节及矛盾冲突,却好看好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张宣强:《我的两部紫阳民歌——创作回顾》) ”

《牧羊恋歌》虽是一出民歌小戏,但它是“文革”结束以后,紫阳民歌剧获得创作新生的开始。它吸收了《嫁嫂》的创作特色,形式上更加灵活,音乐处理上更加民歌化,也就是说作者对民歌的吸纳、运用更加具有匠心。这幕民歌剧与“文革”时期的民歌剧相比,可以说实现了质的飞跃。首先没有程式化、模式化的痕迹,它是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其次是剧情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民歌所营造的音乐感突出;第三人物勾连紧密,悬念制造合乎剧情发展,台词对白干净明快,植入的民歌唱段,自然而又贴切,起到了丰富人物个性的目的。作为诗人兼剧作家的张宣强,多年来一直从事民歌的研究和新民歌创作,因此,他深谙民歌的妙处,在如何使用和发挥民歌的作用上,他一直有自己内在的感悟和心得。《牧羊恋歌》歌词轻盈、欢快,语言极富诗意,看似信手拈来,实是艺术妙手得之的结果。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到会致辞。

他在致辞中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自身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艺事业,提高文艺水平。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在中央这一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紫阳的文艺工作者,或创作,或复演了不少民歌剧,虽然影响不大,但在民歌剧的探索和实践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84年,张宣强创作民歌剧《三请吹鼓手》,这是继《牧羊恋歌》之后的又一佳作。同年底,参加地区小戏调演,获创作三等奖,演出二等奖。1990年12月,汉剧团复排获奖剧目《三请吹鼓手》参加陕西省青年演员小戏调演,获7个奖项。

张宣强的民歌剧构架很小,无论是剧情、语言,乃至人物,都走的是轻灵的路子,他是研究民歌的专家,对于民歌他知之甚深。因此,在构思剧情的时候,民歌的嵌入一直是服务于剧情的。剧情的完成,其实民歌的创作也随之完成,这里面绝对没有硬性的塞入。他创作的民歌剧虽属短剧、小剧,但雅致而又干净,小调与山歌,互为穿插,各呈其妙,而语言,很少使用生僻的俗语、土语,他追求的是语言的自身的通俗性,在明白晓畅中,蕴含一种绵柔的诗意之美。

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紫阳民歌剧的发展虽然处在盘桓、渐进的阶段,但无论是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更加成熟的表现,这一时期,产生的民歌剧有20余个,其中有6个剧目在省、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继鹏2002年5月创作完成《茶山情》,2003年获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剧本奖;张宣强2007年创作《有女为安》,同年获陕西省计生主题会演一等奖;2010年创作《荷塘清风》,获全省纪检系统一等奖。此外,金存的《一孝千金》(2017)、蒋演的《闹热村的热闹事》(2018)、余卫的《清明已煮紫阳茶》(2019)等作品均在创作上有所突破。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民歌剧《茶山情》和《闹热村的热闹事》两个剧作,这两个剧作成功实现了民歌剧向重大题材的过渡,它使单一剧情的民歌剧,在架构上获得重新安排:一是容量增大、内涵增强。人物的塑造趋于多元,人物情感波折与矛盾交织更加复杂;二是对现实的揭示直指当下生活,而剧本的喜剧感则被严肃的、抒情式的情感所取代。由此,紫阳民歌剧进入正剧统领的时代。

《茶山情》首先完成了民歌剧向重大题材过度的破冰之旅。2001年春至2002年5月,刘继鹏从构思到完成写作,花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终于完成了《茶山情》这一凝聚着自己心血和泪水的用情之作。从2003年起,紫阳县为将剧本搬上舞台,一直不竭地努力,然而,因财力上的原因,一次次搁置下来。直到2013年,县委、县政府郑决定投资排演这部尘封十年的剧作,并落实宣传部负责主抓剧作运行中的相关事宜。由于间隔了十年,剧本与当下的现实环境有了隔膜,必须做一些调整和改动,基调原则是:不伤筋动骨,即主线条不动,主要人物不动,其它的支脉可以做一些艺术上的加工和处理,让剧本与当下

的环境、生活相对应,不至于有距离感和陌生感。剧本的改编由著名导演、编剧徐小强负责,参加改编的人员有著名诗人兼剧作家张宣强、剧作家余卫等。2013年底,《茶山情》排练完成,首演时,邀请散居在全国各地当年修建襄渝铁路的学兵连战士前来观看,这些曾经的翩翩少年,如今多已是花甲老人。感人的剧情,缭绕的山歌,把他们带到了过去——那个艰难却又纯洁的如火如荼的岁月,很多人热泪长流,百感交集……

《茶山情》讴歌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紫阳的新变化、新面貌,故事聚焦在茶山上,写了以茶姑为代表的新时代的农民,为了使家乡早日富裕起来,倾心投入茶叶产业,憧憬着在市场上打出紫阳茶的影响。怀着这样的希望,茶姑决定和深圳商人合作,共同开发紫阳茶。无巧不成书,而前来投资的商人恰恰就是当年紫阳修建襄渝铁路的学兵连战士常连春,即茶姑的旧时恋人。剧情主线和辅线交织,故事起伏跌宕,悬念设置扣人心弦,改作在原作的基础上有了某种深化,舞台效果明显,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整台演出高潮迭起,观众多次报以热烈掌声。

2018年,青年剧作家蒋演编创的紫阳民歌剧《闹热村的热闹事》,应该说与刘继鹏的《茶山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一部大题材,大构架的作品,也很难把握的一个作品。《闹热村的热闹事》不是闭门造车之作,它的艺术灵感来源于当下本真的乡村生活,因此,它对题材的挖掘、筛选、确定,都有自己深刻的及其理性的认知。《闹热村的热闹事》直接取材于紫阳县双安镇的闹热村,这是作品的根基所在,它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它的切入点或说它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抓住了当下农村中最突出的矛盾,并围绕这个矛盾,进行艺术化的人性解读,作者找到了开启情感之门和思想之门的钥匙。准确的立意,高远的视角,使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醇厚、增强。《闹热村的热闹事》是安康市精心打造的一台戏,2018年底,西安首演获得成功,观演的很多专家给予了这部作品充分的肯定。

紫阳民歌剧从1959年第一个剧目《嫁嫂》诞生算起,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六十年在时间的长河中虽然不足一瞬,然而,就一个剧种的确立到逐渐成熟,过程却是缓慢的,它犹如破茧化蝶,必须具备内因和外因的诸多条件,能取得如此成绩,也足以让人慰怀了。紫阳民歌剧作为一个剧种的存在,本土化是它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抛弃了本土这一基础,它就断绝了生命。紫阳民歌剧要与民歌同发展、同提携、同生存,这种依附关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割裂的。紧跟时代,贴近生活;歌颂正义,鞭笞丑恶,紫阳民歌剧六十年来一直秉承着这一原则,这是创作的方向和坐标,是蓬勃壮大的持久动力。

### 我与《安康日报》共成长 点一盏灯照亮前路

温浩

无论身居何处,每个人都需要点一盏灯照亮前行的路。

对于出生在大山深处的穷孩子,有饭吃是最大的心愿,有书读是最奢侈的幻想。

我的爸爸是半个文盲,仅仅读了三年书就辍学在家,辛苦而灰暗的成长经历早早教会他“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几十年来坚守的真理。两岁就教我认字,四五岁就被送进学校,六七岁就可以独立阅读,我真算得上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记忆里的,我的阅读是从《安康日报》开始的。爸爸每年订阅《安康日报》,一则方便他了解安康的各种信息,二则可以供我们阅读。80年代的《安康日报》是袖珍版,版面精致,文章短小,很符合我们的阅读喜好。几乎两分钟可读完一篇,省时省力。我喜欢朗读,爸爸喜欢默读,读完偶尔交流,也常因此而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1994年,正值读初中,在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运彪老师的鼓励下,开始尝试把作文投给《安康日报》。一次次杳无音信,我失望透了。郑老师一次次鼓励我,我又继续投稿。就在《安康日报》刊发了我的处女作《青春》。青春之灯就这样被点燃了!

1995年8月,安康的洪水发狂过后,烈日又接着发狂。孤独和焦虑是中考过后等待成绩最难消遣的情绪,巴掌大的小方桌和一叠厚厚的方格信笺纸就是我每天苦心经营的沃土,每天写一篇作文就是宣泄的最好方式。

就是这个8月的某一天,我一个人在家看门。谁曾想到,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到我家门口。我连忙跑出去,两位帅气的叔叔下车了。

“小姑娘,我们的车开锅了,方便给加点凉水吗?”

“当然可以呀。”话音刚落,我转身走进厨房,从水龙头里舀出满满一桶水,吃力地拎着往外走。两位叔叔见状,立即接过水桶,拧到车旁边,打开引擎盖,倒进水箱里。

“小姑娘,车太热了,还要一桶水降温。”

“好勒。”说完我就伸手去提水桶。

“我们自己来吧!”这声音多么铿锵有力。

他们给我加满水,我招呼他们在家里歇会儿。赶紧泡茶、洗李子(家里仅有的可以待客的美食),端出来招呼他们吃。而这空档时间,他们正在看我书桌上的作文。

“这都是你写的?”

“是的,写得不好。”

“挺好的,我们拿去看看。”谁曾想到,这个假期的小作文后来纷纷刊发到《安康日报》了,我知道这一定是两位叔叔的“美好馈赠”。就这样与《安康日报》仿佛有了终生的约定,订约、拜读、投稿、收藏、憧憬、收获。

纵然时光流泻,一晃就是多年,青春早已褪色,而我与《安康日报》的情缘与日俱增,至今都一直订阅《安康日报》,从未间断。多年后,当我有机会再见到那两位叔叔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就是安康日报社的胡弗老师和陈敬老师,那种感激和敬佩之情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

少年时代,阅读《安康日报》,不经意间就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顺着成长的曲线,在青春的沃土上默默生根发芽。那些稚嫩的文字,得益于恩师的潜心鼓励和倾心帮助,随着年轮的磨砺逐渐好转,写作的思路也愈加广阔。从个人的小确幸到对文学和艺术的探究,从教育叙事到对教育事业的思考,从家庭的变化到对乡村生活的展望,都是我写作最暖的范围。

如果说文学是一盏明灯,那《安康日报》就是最亮的那一盏,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工作之余,那些偶尔发表在《安康日报》的零零碎碎的文字,带给我生活诸多的幸运,亦带给我工作环境改变,还带给我精神的愉悦与满足,并永久地爱上了文学。

《安康日报》伴我成长,尤其难忘成长路上对恩师情感的表达。2000年《师生缘》刊发在《安康日报》,那是对我数学老师最真的感激;2001年《生命的价值》刊发在《安康日报》,那是对我因病而去的恩师最好的缅怀;2003年《教育因爱而美丽》刊发在《安康日报》,那是对中国十四大代表、乡村女教师钱东老师的敬仰;2020年《开学在即,老师如何帮学生快速转换频道》刊发在《安康日报》,那是一线老师对学生满满的爱,更是疫情之后对线下教育的思考……

每一篇文字的刊发,都饱含着安康日报社编辑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厚爱,特别感谢写作路上报社老师对我的倾心搀扶,感谢你们精心为那些稚嫩的文字着色添彩。最是难忘2019年写的采风散文《树》,得到编辑老师的精心修改后刊发到《安康日报》,并推荐刊发到《中国文化报》,着实让我感动。报社很多编辑老师都是这样精心搀扶我,并鼓励我坚守写作的初心,胡弗老师鼓励我写作贵在坚持不懈,陈敬老师教会我文字要字斟句酌,吴昌勇老师教会我构思要视角独特,梁真鹏老师教会我文字要真情实感,李小洛老师教会我散文要有诗意和美感……

写作之于人生,真的犹如庄稼之于大地。庄稼是土地的希望,文学是人生最亮的一盏明灯。庄稼需要农民伯伯辛勤地播种耕耘,写作同样也要春耕夏作才能丰收。从处女作《青春》开始,文字在日积月累与反复咀嚼中从量变到质变,至今已发表数百篇文章,从《安康日报》到《中国文化报》《作家报》《教师报》《延河》《散文选刊》《陕西教育》等,还出版了《清水文字》《汉水谣》等散文集,于2018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美的精神背景。

诚然,天赋可以决定我们能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但老师的提携和自我的努力,将决定我们可以走多远。从“青春飞扬”的学生到“青春澎湃”的教师,从业余的写作者到培养学生写作兴趣和技巧的引路人,这一切变化得益于《安康日报》一路相伴,是报社老师们一路提携,如一盏最亮的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激励我努力穿越三尺讲台的枷锁,有勇气去探索着生命的极限。



▲美意延年

□ 王晓琪 作

▲硕果累累

春华秋实